

海明威小说中的空间建构及其伦理维度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and Ethical Dimension in Hemingway's Novels

龚紫斌 (Gong Zibin) 刘久明 (Liu Jiuming)

内容摘要: 在当代空间理论视域下对海明威小说进行解读, 可以发现其从整体上建构了三种类型的地域空间, 即“世界图像时代”的美国社会、作为“新边疆”的美国化边缘地带和“通往中心”的原始自然。由地域空间延展与映射出的隐喻空间则对应呈现为现代伤痛之地的危机与断裂、异质空间的迷惘与疏离、神话之地向真实自我的返归。海明威通过并置与对峙的空间建构策略, 展示了其伦理选择的三种维度, 即对资本主义现代伦理道德的失望与批判、异质空间中的非理性主义道德倾向、在原始自然中寻归与自然合一的古朴道义情感。海明威的空间建构揭示了传统伦理空间的碎裂与失效, 呈现了从属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线性时间观的伦理整体性及极权性的崩溃与解体, 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传统伦理道德不满、反叛及理想空间重建的意愿。

关键词: 海明威; 空间叙事; 地域空间; 伦理维度; 非理性主义

作者简介: 龚紫斌, 华中科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 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刘久明,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和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基金文科重大交叉项目【项目编号: 2017WKZDC016】的资助。

Title: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and Ethical Dimension in Hemingway's Novels

Abstrac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emingway's novel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space theory, it can be found that is clearly constructed as three types of regional space: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the world image age", the Americanized border area as the "new frontier" and the original self of "the center". The metaphorical space extending and mapping from the regional space contains the space of social culture and character consciousness. It corresponds to three States: crisis and fracture in the place of modern pain, confusion and alienation in heterogeneous space, and return of mythological place to real self. Hemingway showed u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thics: the disappointment and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capitalist modern ethics, and the irrational tendency of moral in

heterogeneous space. the simple and moral feelings of unity with nature. It reveals the fragmentation and invalid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space, shows the collapse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integrity of ethics and totalitarianism that are subordinate to the linear time view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and expresses Hemingway's intention of dissatisfaction, rebell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deal space.

Key words: Hemingway; Spatial narrative; Geographical space; Ethical dimension; irrationalism

Author: Gong Zibin, Ph. D., is Lecturer at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Hunan 415000,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397692952@qq.com); **Liu Jiuming**, is Professor a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jiuming2001@qq.com).

卡洛斯·贝克在《事物的本真》一文里曾指出：很少有作家能像海明威一样精心构思小说的地理事实。“地理事实”在海明威小说中不仅指作为叙事背景存在的自然景观，也包括故事人物空间性实践的位所，它是社会、政治、种族、性别等各种权力纷纷登场、相互争斗与不断转换的场域，是一系列被赋予意义的、可以识别的特殊空间。不同的空间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固定性，也具有流动性与开放性，处于不断地“辖域化”、“解域化”运动过程之中。按照德勒兹的空间生成理论的阐释，“辖域化”的过程也是主体受到伤害的过程，在限定的空间里，海明威通过故事人物向我们展示了各不相同的生命存在状态、精神与肉体受到伤害的过程与程度。海明威笔下的人物不断地在不同场域之间进行位移与跨越，这种主体为避免受损而从原本存在的场所逃逸出来的行动是一个持续的“解域化”过程（Deleuze and Guattari 508）。“解域化”带来的不仅是故事人物在地理位置、心理位置和精神位置上的变动，让故事人物从政治、经济、思想、伦理等功能化、等级化的空间里散逸出来而进入多元化、异质性的“他者空间”，更使得原本固定单一的客观现实、线性抽象的时间观念、静态统一的伦理身份变得相对化与不稳定，从而提供了一种反思与解构的思考模式。以空间生成理论为视点，我们会发现海明威赋予了空间远胜于时间的关注，其小说叙事具有多重空间维度，它不仅隐喻性地诠释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境遇与文化意义，而且展示了海明威在现代性语境里对人的存在本质、主体价值和生命伦理选择的思考与判断。近年来，国内学界虽对海明威的小说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却都忽略了海明威小说中的空间建构。本文以德勒兹的空间思想为基础，并融合苏贾、科特等学者的相关空间理论，藉此来观照海明威的生命伦理书写主题，以期获得不一样的解读。

一、并置与对峙：地域空间的建构

地域空间，是一种以物质形态呈现的、可以通过感官直接感知与理解的空间。苏贾在对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进行重构时，提出了“第三空间”的理论，他区分了三类空间，即强调物质维度的第一空间，强调精神维度的第二空间，以及对前两类空间实施解构与重构的第三空间（苏贾 67）。地域空间与苏贾的“第一空间”大致相同，它强调空间的物质基础。作为物质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既包括自然景物与生活场景，也包括作为物质存在的人本身及相关人类活动。海明威小说中包括“印第安营地”在内的美国底层社会、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传统世界、处于文明边缘地带的哈瓦那港口以及原始荒野，都属于这样的地域空间，它是存在于小说之中的一种物态形式，清楚地标注着故事人物的位置实存与位移状况。它不仅作为“容器”成为海明威小说叙事展开的支点，更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主题表达与人物塑造，推动着叙事向前发展进程。

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是海明威的成名作，全书用 13 个短篇小说和 16 个小品段落来建构了“在我们的时代”的北美大陆地域空间。北美大陆作为人类理想家园最初是以“伊甸园”形式被赋予意义的，在美洲大陆发现之前，欧洲人已经持续用极乐世界、阿卡迪亚、科凯恩之地等表达了这种遐思，它体现了人类追怀理想社会的愿景。而当温斯洛普为摆脱欧洲文明陈规陋习的枷锁、率领首批移民登临北美广袤无垠的“荒野”、宣称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上帝在世间的王国之际，北美大陆也与进步主义思想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无论是“伊甸园”想象还是“明天之国”的理想，它们都将北美大陆指向为一个美好的地方，一个人类肉体与精神能和谐共生的理想场所。但随着 1890 年边疆时代的结束，美国开始全面进入工业化时代，人们还未来得及享受科技带给人的便捷与舒适，就开始承受来自工业文明对身心的摧残与挤压。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震对美国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产生了巨大冲击，海明威曾带着追求“神圣”与“荣光”的梦想参加战争，但战争的残酷及反人性的一面，很快让他看清了现实并开始感到厌恶和反感，“每逢听到‘神圣’、‘光荣’、‘牺牲’和‘鲜血不能白流’这样的词语，我总感到脸红”（《永别了，武器》165）。战争不仅在海明威们肉体上留下印记，也让精神之根被拔起，“我们成千上万、几百万的人就像让挖土机从我们自己的土壤上铲起，被倾倒、被散布在陌生人之中。我们所有的根全都死去……染上不负责任的恶习——只要到别的地方去，就可以把问题扔下不管——还有追求危险与刺激的恶习”（Malcolm 40）。当战争宣告结束，海明威们发现“我们的复合祖国似乎分解为争吵不休的政客以及石油大王和钢铁大王……它不再是我们的国家”（Malcolm 41）。战后，美国工商业发展使全国进入一个“分期付款购物和全面推销的新时代”，沾染了商业色彩的美国文化庸俗、没有灵魂，紧随其

后的严重经济衰退，对精神与道德所造成的破坏和战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里，《在我们的时代》所描绘的北美大陆地域空间已非人类肉体与精神和谐共生的理想之地，小说所呈现的美国社会不仅没有和平，反而处处充满暴力、罪恶、恐怖及战争的阴影。从“印第安营地”开始，故事主角尼克无处不在地感受到这种阴影：印第安丈夫用剃刀割断自己的脖子，给小尼克上了令人震撼的人生第一课；当走出营地，尼克莫名其妙地遭到了一个近乎疯癫的黑人拳手的袭击；在小酒馆，尼克目睹了一个杀人与被杀的场面，杀人的随意与被杀者的麻木态度让他震惊不已；而在候车厅，尼克所听到的污言秽语让他更是无所适从，在一个失去了正常秩序的世界里每个人几乎都是颠倒疯狂的。

小说集中的每个故事人物都占据了地域空间中的一个不同点，这个点清楚地标注了每个人物的位置实存，反映出人物的生存状态及命运结局，虽然每个人物在各个故事之间没有固定的必然的联系，但它们“被罗列并置在一起，共同说明着同一个主题或观念”（龙迪勇 5），即在充满现代伤痛感受的北美大陆，归属感与信任感的丧失既撕碎了社会规则和正常伦理秩序，也造成了文化传统的割裂。

美国化的边缘地带——边疆是海明威带着现代伤痛感受去寻找的另一类宜于灵魂安放的地域空间。“边疆”概念在美利坚民族思想文化里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于 1893 年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指出：“每一个边疆的确提供了新的机会，逃出了过去的约束之门；同时也提供了新鲜、信心和对旧社会的漠视，对旧社会诸多限制和观念的不耐心以及对它的教训的漠视”（Henry- Nash 3）。亨利·纳什·史密斯把边疆视作“神话”来进行解读，他在《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里认为：城市的文明，尤其是美国东海岸和欧洲的文明正变得腐败，边疆在美国思想中发挥着“阀门”作用，它意味着当文明变得日益僵化与腐败时，美利坚民族仍能通过这道“阀门”从日益强大和复杂文明的控制下逃脱出来，实现从世故向纯真的迁移（Henry- Nash 4）。

对海明威而言，“边疆”在其作品中有更特殊的意义。事实上，早在海明威出生之前，美国的边疆时代已经宣告结束，这也意味着边疆作为“安全阀门”的作用已随之失效，道德及精神都失去了可供新的生长与更新的源泉。海明威需要寻找一个“新边疆”来替代，而这个地方就是美国化的边缘地带。它并非真正地理意义上的美国国家边界，它是随美国商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以及影响力的日益增强而形成。“一战”前后，美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凭借战争积累的丰厚财富一跃成为世界帝国，美国开始对外输出产品和文化：原材料、成品机器、资金以及“热烈和悦耳的爵士乐队……甚至还有美国神话”（Malcolm 84）。在美国“商业文明”强势影响下，“德国已经向它屈服，英国正在向它屈服，甚至连法国也在受到毒害——逃往伦敦或巴黎也无济于

事”(Malcolm 85), 欧洲及其他许多地方都成为美元所构成的“复合帝国”的一部分。而像法国南部村庄、马略尔卡岛、西班牙的潘普洛拉、瑞士的洛桑小镇等地方, 由于保持了与美元的距离, 仍保留着一些古老的准则与传统。在西班牙, 巴恩斯与朋友们深入布尔格特的山地去钓鳟鱼, 到潘普洛拉去观看斗牛, 他们受到了巴斯克人热情地款待, 领略了那里古老的饮酒习俗。这些地方成为了海明威文本里“复合帝国”的“新边疆”, 是美国商业经济与工业文明延伸产生的边缘地带。这些“新边疆”是一些特殊的地域空间, 它们属于世界多元文化共存的一部分, 却游离于欧美商业文明之外。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在逃离北美大陆地域空间后, 在这个空间停留和暂时被接纳。《太阳照常升起》里, 以巴恩斯为代表的“潘普洛拉荒原人”以及《永别了, 武器》里的亨利等, 都在这样的地域空间里从主流意识中疏离出来而享受了短暂的放纵的快乐时光。

这种边缘化的地域空间与北美大陆地域空间并不存在时间上的连续性, 却因为并置产生的对比而形成一种对峙关系, 海明威在文本中呈现这些边缘地带的空间时, 也反映、抗议甚至颠覆着美国社会空间。巴恩斯和亨利两人的悲剧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他们对边缘化的地域空间的找寻, 不过是在“迷惘”中无奈的逃避之举, 这类空间只能是暂时性供人逗留的场所, 其间充满着混合经验及混乱思想, 虽然可供人自在而为, 但无法使人获得精神上的真正慰藉和灵魂的救赎。

海明威理想中的诗意栖居地是原始自然。这类地域空间由于被以进步论为基础的文明世界所排斥, 因而也与主流社会空间呈对峙状态。这类地域空间包括“最后一方清净地”、大二心河、非洲草原、哈瓦那的大海和乞力马扎罗雪山。这些地方, 有的保持了至善和谐的一面, 是理想中美好的样子。“最后一方清净地”、大二心河都恬静幽美, 未受现代文明的侵蚀, 投身其中的主人公得到身心最大程度的愉悦与放松, 灵魂获得净化与升华。在“最后一方清净地”, 尼克与妹妹逃遁到原始森林的深处, 也将纷扰的现实隔绝在铁杉林之外, 他们在原始森林里从心灵上回到了创世之初的状态。在“大二心河”, 尼克生火做饭、睡觉、垂钓, 一切怡然自得, 没有欲念与烦扰。在非洲草原, 作为故事主角的海明威很快就融入其中, 他似乎又回到了童年记忆中的美好之地。而像乞力马扎罗雪山、哈瓦那的大海这样的原始荒野, 是凄凉、严酷、不可侵犯的, 人在这里渺小且无足轻重, 但自然“虽然严厉, 也很公正; 是个毫不通融的执法者”, 自然的严厉要求人必须改变自己才能适应, 改变意味着“撕去了装饰在文明表面的许多东西——所有的愚蠢行为, 大部分的弱点和缺点……也许还带走了一些美德”(李淑言 325)。改变后的人们重塑了勇气与激情, 找回了文明陈规陋习枷锁压抑下失落已久的人之天性, 他们坦然、诚实、有足够的勇气。《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中的作家哈里和《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都在这样的原始自然里经历了“试炼”, 并在与自然

的融合中，获得了一种与大自然相匹配的能力、勇气和品格。

综上所述，海明威文本中建构的地域空间有包含美国社会的北美大陆、作为“新边疆”的文明边缘地带及原始自然三种类型，海明威通过运用并置与对峙的叙事策略，在位置实存中反映了人的生存状态与命运结局，在人物的位移过程中体现着社会差异与对抗，地域空间成为了聚焦“在我们的时代”一切重大社会问题和探索人类去路的符码。

二、延展与映射：隐喻空间的生成

空间本身不具备社会属性和心理意识，只是置身其中的人处于各种复杂关系的包围之中，在各种关系的交互过程里，人也通过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认知模式表达出思想与情感，空间因而具有了表征社会生活经验现象和表意人物心理意识活动的功能。人将在地域空间体验所形成的意象图式映射到非空间的人类精神与意识世界，这样就构筑出了与地域空间对应的隐喻空间。隐喻空间包含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它并非实体存在的空间形式，而是依赖于地域空间以及作为地域空间的延展而生成。隐喻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 (Julian 187)。因而，通过对隐喻空间里人物的社会生活经验、行为与认知反应模式以及内心活动的解读，我们可以挖掘出文本中蕴涵丰富的社会意义和人类共通的心理图式等。海明威小说中的隐喻空间也是地域空间延展生成的结果，三类地域空间既体现着各种社会关系的建构，也体现着人物心理对外部世界的映射和编辑。

在海明威所建构的北美大陆地域空间，对应呈现的社会空间充满了危机与断裂感，映射出的心理空间则呈现为包含着压抑、挣扎、反抗与逃逸的现代伤痛感受。北美大陆地域空间受工业化和商业文明的严重腐蚀而败坏不堪，因而所呈现出的美国社会文化空间也处处充满了怪诞色彩。《三下枪声》、《印第安营地》所描述的宇宙自然是混乱的，充满了压抑与恐惧，人随时面临的都是生与死的考验；《最后一方清净地》、《十个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搬走了》、《两代父子》里，随着自然在文明面前的败退，自然秩序也逐步消失，就连遵循其规律的印第安人也不可逆转地堕落与消亡，“他们的归宿如何并不重要。反正他们的结局全都一样，当年还不错，眼下可不行了”（《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515）。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规则也土崩瓦解，《我老爹》中巴特勒在赛马世界里毁坏规则，与堕落者同流合污，最后被这个规则丧失的世界所吞噬；《杀人者》里杀人与被杀成为司空见惯的平常事，《拳击家》的疯癫状态及对事情不可思议的处理方式，《有钱人和没钱人》里哈里·摩根的疯狂偷渡行为，都说明了社会秩序的解体与约束力的丧失；《太阳照常升起》中以杰克巴恩斯为代表的潘普洛拉“荒原人”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表明了文明的彻底崩溃。这正是一个海德格尔所描绘的“世界图像的时代”：

“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Heidegger 80)。现代性使人从中世纪束缚中解放出来，人可以完全支配自己的命运，成为绝对的主体。当人的主体地位得到最终确立之后，世界就成为人的表象物，是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而非物质或精神的实体，世界因此而成为“图像”，这个“图像”是一种与主体相对的表象。海德格尔还指出，世界成为图像并非指世界就是图像，而是“世界被把握为图像”(Heidegger 90)。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化的过程也就是世界对象化或物化的过程，人利用科学技术去把握世界和认识“图像”，世界的意义被简单化为实用性的物。

海明威笔下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图像的时代”，物丧失物性沦为人的表象，人成为主体之际又沦为技术化的碎片，人的存在本真状态被遮蔽。在这个社会空间里，社会权力、种族、阶级与性别等都呈现出严重的矛盾性与不平等性。主流意识与话语无法深入到达底层社会，身处边缘地位的人群既表达了不服从与反叛的决绝态度，又无法找寻到身体与灵魂的出路，社会处于危机与断裂状态，人在异化中走向毁灭，人物内心充满了现代伤痛感受。

而由美国化的边缘地带延伸出的社会空间，它们明显具有特殊性、另类性和异质性。在这些特定空间，意味着能够回到现代工业文明之前，因为这里维持了事物过去的面貌，保存了完美的传统技艺——如斗牛、拳击等，甚至还可以回到更久远之前的原始状态——通过旅行去到某条河流垂钓。在像潘普洛拉这样的地方，可以通过节日（奔牛节）与度假（垂钓）的方式，让时间变得更琐碎、短暂和不稳定，从而获得原始的、暂时的、不加修饰的生活体验。这些特殊的、另类的和存在明显界限的空间，就是福柯提出的“异托邦”形式。在《另类空间》里福柯说到：“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明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真实的场所、有效的场所，它们被书写入社会体制自身内……在这些场所中，真实的位所，所有能在文化内被发现的其他真实的位所被同时表征出来，被抗议并且被颠倒；这些场所是外在于所有的场所的，尽管它们实际上是局部化的。因为这些场所全然不同于它们所反映，它们所言及的所有位所，所以，与乌托邦相对立，我称它们为异托邦”(Foucault 52)。福柯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世界上不可能不存在一个不构成异托邦的文化”，世界文化的多元共存本身就构成“异托邦”(Foucault 53)。我们可以从福柯的阐释中得出结论，作为社会空间的“异托邦”，它指一些特殊的、另类的和存在明显界限的空间，它既包括范围较小的如博物馆、墓地、度假村、精神病院、监狱等社会体制内的特异位所，也指较为宏大的多元文化时代一个相对恒定不变的边缘化社会。“异托邦”里的时间或者像文物般被累计而失效，或以度假和节日的形式而变得更松散，由于时间的不稳定性，世界不再以诸如理性、进步等普适性观念的形式呈现，有的是不同标准、不同因素以不同方式组合起来的复杂系统，这对抗与颠覆了固有秩序里的正常逻辑，

“异托邦”在呈现另类与探索界限之际揭示了某种逻辑所遮蔽的“真实”。

海明威描写的美国化边缘地带就具有“异托邦”的基本特征，它们不仅以异质空间形式来呈现与反衬外部现代伤痛世界，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反思与解构的思考模式。潘普洛拉及瑞士小镇洛桑等显然都属于这样的“异托邦”，在这里，巴恩斯与亨利能够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分崩离析，那些急剧变化的社会内容与持续激烈的冲突给他们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记忆，异质空间一侧是一个不能让人认可为真实存在的地方，那里只存在着一些在理性与进步理念统摄下的幻影与表象。而正是从伤痛感受之处开始，海明威笔下的人物把目光从表象世界深处拉回来并投向自己，重新认识与塑造自我。他们在从主流社会空间逃离而进入异域空间后，也自觉同主流意识疏离开来，清教理想、社会认同、永恒价值等传统观念在边缘地带明显处于解体状态，而追求个体自由自在和感性解放的快乐原则则构成了生命的整体意义，这是呈非理性状态的，它与早自19世纪上半期以来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在认识到思辨理性的空洞软弱和工具理性的非人化之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公开向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发起挑战。叔本华建立了以人的现实存在为理论基点的意志主义哲学，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认为意志是自在之物，是人存在和世界的本源，而意志的欲求就是生命。克尔凯戈尔则认为历史理性主义“忽视了生命问题和现实的个人体验，把不可重复的情境排除于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为了无名无姓的冷漠的绝对精神而牺牲了现实中的、活生生的、心情不安的人”(mitloshin 12)。他主张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个体生命、人类生存和个人的当下不幸。

受以上非理性思想文化的影响，海明威异质文化空间中的人物摒弃了理性、进步等普适性观念，放弃了清教理想、社会认同、永恒价值及责任意识，他们甚至抛弃了对线性时间的直观感受，而呈现为一种非理性状态，这是刻意为之的对抗与颠覆固有秩序的行为。在转向以生命为主体后，人物心理展示为因个体解放而感受到的自由自在，因逃离约束之门而获得放纵的感性快乐，但也因异质文化空间里充斥着混合经验及混乱思想而“迷惘”，故事人物始终处于伦理两难的尴尬境地。

科特在《现代小说中的地点和空间》中区分了三种空间：宇宙空间（或总体空间），社会空间（或政治空间），个体空间（或私密空间）（Kort 149）。宇宙空间（或总体空间）主要指自然与风景，海明威小说中的原始自然大致与科特的宇宙空间（或总体空间）相一致。但海明威建构的这一类地域空间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背景或语境存在于小说之中，由于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在这类地域空间里频繁活动，也体现着社会关系和人物心理图式。在这个空间，无论是置身于至善和谐、恬静幽美的自然环境，还是“试炼场”，其实质都是对真实自我回归的一种寻找，这种自我就是文明侵扰之前存在于

原始家园的未受污染的纯粹自我。返归原始家园也是通向神话之地、通向永恒、通向“真实、持久和富有意义”所在地的行动过程，按照神话学者迈阿西·爱列德的说法，那是“一个从世俗到宗教，从短暂虚幻到真实永恒，从死亡到生存，从人性到神性的过程的仪式。到达中心相当于一种奉献，一种开始，昨天的世俗的虚幻的生存方式被一种新生，一种真实、持久而富有意义的生活所代替”(Sevier 35)。在带有原始色彩的大自然中，海明威笔下的人物从心理空间废除了实体性的时间，进入到一种循环往复的状态，回到了创始之初，在与自然融合中获得了勇气与力量，恢复了自由心性，精神上得到了满足，在实现对人低层次本能的超越时，也超越了个人苦难，寻回了生命存在的理由与意义。

三、碎裂与重建：空间叙事策略中的伦理维度

伦理道德在现实层面不仅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也体现在人的空间实践过程里，这必然与空间产生联系并受到空间约束，所以，叙事空间也就具有现实层面的伦理性。空间叙事也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它还蕴藏着某类人文思考和终极关怀，而这种人文思考和终极关怀就体现为一种伦理维度，所以空间叙事不仅是形式技巧的建构，还呈现出了伦理意义。

在海明威建构的每类空间里散布着各种各样的人物，每个人物都有各自的伦理立场，这些伦理立场有可能相似或相近，也有可能针锋相对，但它们共同作用于同一个空间，从而使不同空间呈现出不同的伦理色彩，而具有不同伦理色彩的空间中人物的伦理身份也各不相同。海明威叙事空间中的人物伦理身份呈现与传统叙事不同，传统叙事中人物伦理身份呈静态性和统一性，不能随意逾越，伦理意义是先天给定的，具有约定俗成与不证自明的特点。海明威建构的叙事空间处于不断地“辖域化”、“解域化”运动过程之中，具有流动性与开放性，空间因重组而打碎了传统的统一性和有机性，伦理身份在空间里因而不再具有稳定性质。

因为重组带来的现实改造力量，海明威建构的美国主流社会空间里具有先天给定性质的传统伦理价值变得悬而未决，又因为悬置而使得从属于线性时间观的拘禁人性的伦理身份变得极其可疑，进而遭受到质疑与批判。在美国主流社会空间，随着自然秩序消失和社会规则的丧失，文明社会的伦理道德也遭到毁弃，伴随“进步”而来的是一系列伦理困惑与伦理混乱的现实。

《密执安北部》的主人公吉姆用近乎原始的粗暴占有行动，打破了莉芝关于文明社会对美好爱情应有面貌的憧憬与想象；《阿尔卑斯山牧歌》中的白人农民奥尔兹对妻子尸体麻木不仁的处理方式，是对“白人中心论”的公开嘲讽，也表明以白人身份为道德主体的现代社会伦理的虚伪与野蛮；《医生夫妇》、《世上之光》、《赌徒、修女和收音机》展示了在一个怪诞的世界里，即便是宗教也无法带来伦理上的和谐一致，它只能是虚幻和具有麻醉性质的。这

表明在现代性冲突面前传统伦理身份是混乱的，其解体是不可避免的。海明威藉此表达了对以理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传统伦理道德否定、嘲讽与批判态度，这达到了伦理解构的目的。

在文明边缘的异质空间里，显然更受关注的是个体生命、个人情感情绪以及存在性悲剧体验，“一切社会思想都是骗人的，唯一有价值的是人所直接感受到的东西。”这个空间充斥着“酒的香味、鱼的腥气、性爱的欲望、滑雪的乐趣、松针的弹力、斗牛场的刺激”，（邱平壤 18）而虚假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业已崩溃，在异质空间，人的伦理身份与其所呈现出的非理性本能形式、感性解放的快乐道德原则和原始欲望具有一致性。《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巴恩斯、布列特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朋友，过着颠倒、混乱、无序和颓废的醉生梦死的生活。《永别了，武器》里，亨利在从卡波雷托大撤退到通往瑞士小镇洛桑的路上，一路丢盔弃甲，先后丢掉了他曾为之坚守的尊严、勇气、责任、爱国、高尚等主流社会空间的道德思维逻辑，因为残酷的战争使他明白，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它给人带来的只能是受伤、侮辱、欺骗与混乱，他只想“同凯瑟琳睡觉”。所以，他单独与战争讲和，带着凯瑟琳一路逃到洛桑，成功切断了与主流社会空间的联系，重新开始构建自己的生活。而无论是杰克还是亨利，他们都在异质空间里表现出非理性伦理道德倾向，这可视为一种反抗行为，它颠覆的是主流社会空间里看似正常实则混乱的道德逻辑。但异质空间里非理性形式的伦理身份同样也令人质疑，因为听凭原始本能驱使的自我放纵和自由自在并不等同于人性的解放，反而是人性迷失的有力证明。

在从纷扰复杂的大千世界中隐退和“返归中心”后，面对赤裸的自然与真实的自我，海明威笔下的人物从简单的善恶道德观念中抽离出来，而返归为一种与自然合一的古朴情感，它表现为原始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生存、信仰、劳动以及忠诚友谊等，这是与个体对生命的体验、人类对生存整体秩序的关注紧紧缠绕在一起的。这实质上是返归到了人类原初的伦理意识之中，“原始人类对相互帮助和共同协作的认识就是对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如何建立人类秩序的理解。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伦理性质的，因此以相互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形式建立的集体或社会秩序就是伦理秩序。人类最初的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伦理秩序和伦理关系的体现”（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14）。在古老的伦理秩序中，生命存在法则替代了社会道德规范，它具有明显的自然强制性和原始质朴性。在自然面前，人类渺小而无助，但无尽的生存欲望、不屈的抗争意识、原始的荣誉感、生命的整体性、互助的美德以及良好的协作精神不仅使人获得了生存的权利，也重新赢回了道德上的胜利。在苦难与死亡中，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实现了对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认，获得了人类主体的价值感和超越感。

三类空间在并置与对峙中表现出伦理意义上的对比，这种比较关系势必

会引起对空间伦理价值的选择，而这种伦理选择就达到了实现伦理突破与重新进行伦理建构的目的。在空间对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明威向我们展示的主流空间伦理身份是破碎与失效的，充满了伤痛与遗憾。文明边缘的异质空间具有颠覆与“解放”性质，但也只能供人用来暂时逃避，其伦理身份处于混乱与无序状态。而在与自然合一中，海明威笔下的人物获得了情感与心灵上的真正慰藉，实现了自我身份认同与超越。所以，海明威笔下的人物不断从主流社会空间到异质空间再到原始自然空间的位移过程，也是不断打碎与重新建构道德伦理的过程，它不仅使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否定与批判成为可能，也让重构理想伦理道德的愿望变成现实。

Works Cited

- 爱德华·W·苏贾：《第三空间》，陆杨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Sawyer Edward, W. *The Third Space*. Trans. Lu Yang etc.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2005.]
- 海明威：《永别了，武器》，方华文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6年。
[Ernest, Hemingway. *A Farewell to Arms*. Trans. Fang Huawen. Shanghai: Yilin Publishing House, 2016.]
- ：《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陈良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 Complete Short Stories. Trans. Chen Liangting, etc.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6.]
- Deleuze G. and F.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U of Minnesota P, 1987.
- 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薛蕃康、费翰章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
[Smith Henry- Nash. *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a Symbol and Myth*. Trans. Xue Fankang and Fei Hanzha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6.]
- KORT W. A. *Place and Space in Modern Fiction*. Gainesville: UP of Florida, 2004.
- JI·H·米特洛欣：《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李昭时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Mitloshin JI. H. *Bourgeois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Trans. Li Zhaoshi, etc.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
- Wolfreys Julian.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2.
- 李淑言：《杰克·伦敦研究》。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Li Shuyan. *Jack London Research*.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1988.]
- 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
[Long Diyong. *Space Narrative Research*.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 Cowley Malcolm. *Exile's Return: A literary Odyssey of the Nineteen-Twentieth*.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4.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Heidegger Martin. Holzwege. Trans. Sun Zhouxing.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4.]

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6（2006）：52-53.

[Foucault Michel. Alternative Space. Trans. Wang Zhe. world philosophy 6 (2006): 52-5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4.

[Nie Zhenzhao.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Basic Theories and Terminolog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 1-14.]

保罗·塞维劳：“海明威的原始主义风格在“大二心河”中的典范体现”，王占吉译，《呼兰师专学报》4（1995）：34-37.

Paul, Sevier. “Hemingway’s Primitive Style as a Model in ‘Big Two — Hearted River.’” Trans. Wang Zhanji. Journal of Hulan Teachers College 4 (1995) : 34-37.]

邱平壤：《海明威研究在中国》。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

[Qiu Pingrang. Hemingway ‘s Research in China. Haerbin: Heilongjiang Education Press, 1990.]